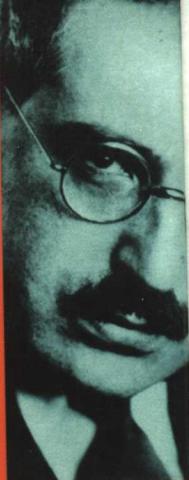


# 沃尔特·本雅明 或 走向革命批评

[英国]特里·伊格尔顿 著 郭国良 陆汉臻 译

译林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 沃尔特·本雅明 或走向革命批评

[英国]特里·伊格尔顿 著 郭国良 陆汉臻译

(松)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沃尔特·本雅明 / (英) 伊格尔顿 (Eagleton, T.) 著; 郭国良, 陆汉臻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10

(译林传记译丛)

书名原文: Walter Benjamin

ISBN 7-80657-868-4

I. 沃... II. ①伊... ②郭... ③陆... III. 本雅明, W. -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099 号

Copyright © 1981 by Terry Eaglet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1-035号

书 名 沃尔特·本雅明  
作 者 [英国]伊格尔顿  
译 者 郭国良 陆汉臻  
责任编辑 朱进东  
原文出版 Verso, 199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电子信箱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55 千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868-4/I·629  
定 价 16.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假如剥夺了工人阶级子女对非物质财富的共享，很快他们就会成长为要求物质共产主义的危险人物。

亨利·纽伯尔特爵士，《英格兰的英语教学》的政府报告，1921年

[文化史]也许确实增加了人类身上财富的重负，却没有给人类甩掉这一包袱，从而把它掌握在手中的力量。

沃尔特·本雅明，《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

献给托利尔

## 序　　言

一天下午，沃尔特·本雅明闲坐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双叟咖啡馆，其时他灵感激荡，想为自己勾勒一幅人生图表。此时此刻，他清楚地知道该从何下笔。他画出了这个图表，可是大约一两年后，却由于典型的运气不佳将它遗失。于是这一图表成了一个谜，这毫不令人意外。

本书并非那幅图表的复原，也非本雅明著作的导论或高头论章，甚至并非一篇“评论”，因为尽管笔者似乎是在“详尽地阐释”本雅明的思想，但其实几乎对他的文本不作任何概括或转述。相反，我试图为自己目的而粗暴对待其文本，将它们轰出历史连续体，我以为他会认同我所采取的方式。笔者的话语与本雅明的话语之间并非是一种反思或复制的关系，而更像两种话语叠加而产生出第三种话语。它完全不属于这两种话语中的任何一种。由于本雅明本人敌视学院生产方式，以及他的文本据以拒斥简化的复杂策略，因此很难透彻了解对本雅明的全面“评论”会是何种样子。本雅明之所以对惯常的书籍生产如此嘲讽和反感，这与他的政治见解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促使笔者写作此书的动机也是政治性的，而非单纯为了学术研究。通过写作此书，我想我可以发现本雅明是如何在其著作中阐释“革

命批评”目前正面临的某些关键问题的。仿效本雅明本人的方式，本书有意没有写成一个“有机整体”：尤其是第二部分的逻辑性，除了依靠文本之外，还需读者自身去揣摩建构。

因此，在这些方面，本书标志着拙著《批评与意识形态》（新左派书屋，1976年）的一种发展。就形式和风格而言，《批评与意识形态》更带有常规的学术色彩，而不似本书如此明显地具有政治色彩。不过此一发展并非我专有独创。在笔者撰写《批评与意识形态》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尚未在英国立足，那时候重要的似乎是考察其历史背景，并且使“文本科学”所必需的范畴系统化。尽管此类方案的原则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但笔者仍将为之辩护。部分是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重重压力，部分是受到社会主义内部新主题和力量的影响，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中心，已从狭隘的纯文本或概念分析转移到了文化产生问题和艺术品在政治中的运用。与这一普遍转变相交织的是笔者本身自写作《批评与意识形态》以来的演变发展。介于本书与《批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是一部戏剧，即《布莱希特及其同伴》（1979年）。这部戏剧不仅在写作过程中，而且在最终结束时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关系、它们两者与革命政治的关联、知识生产技巧、戏剧和喜剧在政治上的运用等问题。此种研究方向上的转变又与笔者本身自写作《批评与意识形态》以来的个人或政治生活的某些深刻变化有隐约的关系。

写作一本论述本雅明的书之所以显得合适，还有另外的原因。尽管本雅明是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培养成人的，但他却倾注全力于革命改造这一重任；因此，不论当今学术界马

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个人阶级来源如何，本雅明的生平及著作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挑战性。在历史剧变之际，在每位唯物主义脑力劳动者都务必审慎地考察自身的政治资格时，这一点尤为真确。此外，依笔者之见，本雅明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在其著作中令人瞩目地预言了后结构主义的许多当代主题。因此，本书除研究本雅明的其他方面外，也旨在介入那些争论。不过，笔者写作这第一部（我相信是）研究本雅明的英语专著，也是为了抢在反对者之前去理解他。批评界把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视为偶然发生的过失，或者可以容忍的怪癖，一切迹象表明，他如今正面临着被这样的批评界僭用的危险。弗兰克·克莫德曾说，若是本雅明没有英年早夭，他“如今该八十六岁高龄，或许已成为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国荣誉退休教授”。<sup>①</sup>可以想像，本雅明对如此前景会报以何等的欢欣快慰。“假若沃尔特·本雅明依然健在，”乔治·斯坦纳断言，“他毫无疑问会对任何‘新左派’持怀疑态度。正如每一位致力于深奥思想或渊博学识的人一样，本雅明明白，不仅是人文学科，而且人类智慧和批评才智本身，就存在于对极少数人的时刻受到威胁的保留之中。”<sup>②</sup>在我看来，这些话与真实情况恰恰相反，简直是对本雅明的侮辱。笔者写作此书的最终原因，也是最简单的原因，乃是表达对本雅明的敬意。他在那黑暗的时代教导我们：正是地位低下、默默无闻的人们才将把历史炸开口子。

---

① 参见《每一种才智》，载于《纽约时报书评》，1978年7月30日。

② 沃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导言”，新左派书屋，1977年，第24页。

在此,笔者感谢弗朗西斯·穆尔赫恩、伯纳德·夏拉特和保罗·蒂克尔,他们对本书的草稿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意见;感谢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俄勒冈州诸大学和澳大利亚迪金大学的全体教员和学生,他们就许多问题与笔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感谢康奈尔大学人文科学协会在笔者写作此书的最后阶段邀请我担任资深访问研究员。此外,托利尔·摩伊就一些观点与笔者进行过深入探讨,以至于很难说这些观点是“她的”或“我的”;笔者还应感谢她为此书打印手稿,并以无比的耐心、温和的心境忍受如此长期的单调工作,且帮助笔者保持清醒冷静。

特里·伊格尔顿  
牛津沃德姆学院

# 目 录

序言 .....	1
<b>沃尔特·本雅明</b>	
第1章 巴罗克寓言 .....	3
第2章 灵韵和商品 .....	32
第3章 历史、传统和革命 .....	55
<b>走向革命批评</b>	
第1章 “马克思主义批评” .....	107
第2章 修辞小史 .....	133
第3章 论文本性 .....	150
第4章 马克思主义与解构 .....	173
第5章 狂欢与喜剧：巴赫金和布莱希特 .....	189
第6章 历史的天使 .....	230
向沃尔特·本雅明致敬 .....	239
英汉人名对照 .....	241

沃尔特·本雅明



# 第 1 章

## 巴罗克寓言

沃尔特·本雅明觉得  
不只是留下碎片供人捡拾  
那简直是辱没人格；  
他的《起源》表明  
上帝赋予我们头脑  
就是要让意义本身断奶。

艾伦·沃尔

过去二十年的一大显著标志乃是逐渐发现了沃尔特·本雅明，其实这并不令人惊诧。因为，他奇妙地把唯物主义“生产美学”一切强有力的捣毁偶像之举与迷人的犹太人教奥秘学说糅为一体。有谁比这样一位作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具吸引力呢？确实，当我们在媒体技术与唯心主义冥思默想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之际，谁能更加令人信服地教导我们呢？我们发现，在劫数难逃、辛酸尖刻的本雅明这一人物身上，反映出了我们自身的某些矛盾欲望：我们希冀意外的解放，我们对偶然性怀有恒久的喜悦。《德国悲剧的起源》就处于这些冲动的交会点上——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既比17世纪的悲悼剧更辩证有力，又更具引

人入胜的神秘色彩。

本雅明向17世纪的回归必然会令人想起T. S. 艾略特和F. R. 利维斯显然相似的姿态，这对一位英国批评家来说尤其如此。20世纪的英国文学批评由于受到其自身意识形态创造阻挠，对它业已重写为奥古斯都全盛时期的18世纪深感焦躁不安。它向那个人为的太平盛世回首瞻望，在骚动的前辈中瞥见了可谓其自己的形象。然而，本雅明之所以求助于悲悼剧，绝不是仅仅为了与那一计划并行，而是为了干净利落地揭示其意识形态基础。F. R. 利维斯在《重估》中论及约翰·多恩时指出：他的“语音、节奏和音调呈现口语特点……[展示]出自然谈话的重音和语调以及口语所特有的简练……”<sup>①</sup>蒲柏的诗句有着类似的表现力：“在蒲柏的每一诗行中，我们都可以想像出一条极其灵活和复杂的曲线，它体现了朗读时的速律和语调的抑扬顿挫……”<sup>②</sup>弥尔顿的语言灾难所不幸地抹去的正是文字中这一鲜活声音的踪迹。弥尔顿的语言“不在特别的表现力上下功夫，而是生搬硬套，虚张声势，拘泥陈规”；他的谴词在最糟糕时“佶屈聱牙，迂腐卖弄，尽耍小聪明”；冒失的符号飞扬跋扈，把对“知觉、感觉或事物”的那份关注招揽到自己身上，而培育这些东西才是它的本分。<sup>③</sup>弥尔顿枯燥而做作的话语表明，他的媒介“切断了与言语的联系——言语属于实际生活的情感和感官肌

<sup>①</sup> 《重估》，伦敦，1949年版，第11, 13页。

<sup>②</sup> 同上，第31页。

<sup>③</sup> 同上，第49页。

理，并与神经系统共振同鸣”。<sup>①</sup>与此相反的是，多恩的“自然”恰恰玄妙地根植于“地道的言语”中。艾略特同样追求那种渗入“大脑皮层、神经系统以及消化道”<sup>②</sup>的诗歌，而且在多恩那里而不是在弥尔顿那里发现了这种有血有肉的符号。弥尔顿的诗歌“离普通口语相差甚远……”<sup>③</sup>，致使早期的艾略特望洋兴叹，自愧弗如。

对这两位批评家而言，多恩与弥尔顿之间的对比是“视觉”想象与“听觉”想象之间的对比。其实，他们发现败坏弥尔顿的东西乃是不可简约的表意的过剩，这一过剩扭曲了符号真正的表现功能——而且，用利维斯的话来说，显示了“对文字的感受，而不是通过文字去感受的能力”<sup>④</sup>。我们不妨把那种表意的过剩称为书写(*écriture*)；在本雅明看来，它就存在于悲悼剧的核心之处。17世纪的寓言被象征符号和象形文字所纠缠，是一种深邃的视觉形式；然而飘进视觉的东西恰恰是字母本身的物质性。并不是说字母扭曲和消除自身以变成“知觉、感觉或事物”的承载者，正如利维斯要我们相信多恩的那样。与此相反，“寓言深刻的洞察力一举将事物和作品转换成了激动人心的写作”。<sup>⑤</sup>寓言的能指“不仅仅是即将被知晓的事物的一个符号，而且其本身即是一个值得了解的对象”<sup>⑥</sup>；它的指称力量和它复杂

① 《重估》，第51页。

② 《玄学派诗人》，见《艾略特文选》，伦敦，1963年版，第290页。

③ 《T. S. 艾略特散文选》，弗兰克·克莫德编，伦敦，1975年版，第268页。

④ 《重估》，第50页。

⑤ 《德国悲剧的起源》，约翰·奥斯本英译，新左派书屋，1977年版，第176页。

⑥ 同上，第184页。

的实体性是不可分割的。本雅明说，悲悼剧的写作“并没有靠有声而达到超越；而书面语世界倒依然自给自足，执意要展示自己的实体”。<sup>①</sup>

这并不是说这种写作根本不是“有声的”——声音只不过被书写的物质厚重性抑制了。相反，巴罗克寓言的能指展现出一种辩证的结构，其中声音和文字“在尖锐的对立中相互对峙<sup>②</sup>，迫使话语内部分裂，让人凝视其深处。对本雅明而言，那个分裂是本体论的：口语表示“人的自由、自发的言说”<sup>③</sup>，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心醉神迷，与寓言语言所导致的对意义的惟命是从相抵牾。形状和声音逃脱了这一奴役，对巴罗克寓言家们来说，它们扮演了一个自娱自乐、纯粹是感官享受的剩余物的角色，这一残留物超越意义并凌驾于意义之上，毫不留情地玷污了一切书面语（诚然，这里的“书面语”仅仅指“语言本身”而已）。语言竭力用洪亮的声音来伸张其创造物的权利，却被冷酷地贬为意味；按照克里斯蒂娃之意，“符号”是在意义的门槛下松松散散地发出的冲动的咿咿呀呀之声；它进入了“象征”的制约之中，但还是尽力与“象征”保持一种异质关系。<sup>④</sup>只有在巴罗克寓言的回声游戏中，才能找到这种制约的最佳意象。这回声本身实际上乃是声音的自由嬉戏，却为了戏剧意义而被用做回应、警示、预言等；回声被肆意地归附于意味领域，它那空洞的共鸣则

<sup>①</sup> 《德国悲剧的起源》，第201页。

<sup>②</sup> 同上，第201页。

<sup>③</sup> 同上，第202页。

<sup>④</sup> 参阅《诗歌语言的革命》，巴黎，1974年版。

有消解的危险。

故而，本雅明在悲悼剧中发现了物质性与意义之间的深深的鸿沟——隔着这条鸿沟，双方始终在竞争。艾略特在弥尔顿身上所觉察到的恰恰正是这一点：“要从《失乐园》中萃取来可能的一切，”他论道，“似乎应以两种不同的方式阅读，首先只读其音，其次再读其义。”<sup>①</sup>本雅明所指出的那一符号矛盾被解析为不同的读法。对利维斯而言，“弥尔顿的音乐性”与外部装饰相差无几，拙劣无比，与意义的喷涌格格不入。两位批评家竟然如此不约而同地贬损他，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本雅明无情地祛除了他们所信奉的审美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即象征意识形态。象征必然要理想化，必然要使物质客体服从于一种从内部启迪和救赎它的精神激流。在那理想化的闪现中，意义和物质性调和为一；在这脆弱、非理性的一瞬间，存在和意味和谐地整合成了一体。依据这些充满吸引力的概念，寓言不显得罗嗦、机械和粗率是不可能的，而其实本雅明也深谙其道。由于寓言倾其全力是为了苦苦地挽救真理，因而他的整部书不就是悉心地从历史的“巨大恩赐”中挽救寓言吗？象征主义彻头彻尾地诋毁寓言，正如说话之声的意识形态彻底地羞辱了文字；虽然本雅明本人没有完全作此联系，但它们确实有关。寓言的对象已经受了一场精神大出血：这一抽干了一切内在意义的对象成了寓言家手中任意操纵的纯粹事实，等待着他或她灌输意义。没有什么比写作实践本身更能恰如其分地展示这一情形。它把原子化了的物质碎片引入了无穷无尽且无动机的意义星座中。在巴罗

<sup>①</sup> 《T. S. 艾略特散文选》，第263页。